

病人永远是 我的老师

王忠诚院士传

李家杰 / 著
作家出版社



病人永远是 我的老师

王忠诚院士传

李家杰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病人永远是我的老师：王忠诚院士传 / 李家杰 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5
ISBN 978-7-5063-8854-2

I. ①病… II. ①李… III. ①王忠诚 (1925~2012) -
传记 IV. ①K8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3722 号

病人永远是我的老师——王忠诚院士传

作 者：李家杰

责任编辑：韩 星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作家在线）

印 刷：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70×240

字 数：270 千

印 张：16.5

版 次：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854-2

定 价：36.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 言

在中国神经外科史上，王忠诚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标志。在王忠诚之前，国内缺乏高倍显微镜、CT、MRI、神经外科导航仪等现代检测观察设备支持，在攀登神经外科技术高峰的过程中，无人达到他后来达到的高度；在他之后，神经外科手术分工精细，医生工作面变得狭窄，在征服神经外科疾病病种的进程中，后人几乎不再有可能达到他的广度；在同时代人中，包括基础理论和临床技术，两个方面都无人达到他的深度。

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向王忠诚颁发“最高荣誉勋章”；中国国家主席向王忠诚颁发“最高科学技术奖”；率中国神经外科代表团出访日本、澳大利亚、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墨西哥、法国、美国、苏联；多次在国际顶尖级专题学术会议讲坛上做报告，形成合力，将王忠诚推到全世界神经外科患者及家属面前，成为闻名遐迩的公众人物。然而，在公众形象背后的那个王忠诚却鲜为人知，甚至有些让人捉摸不透。

王忠诚的内心世界像大门紧闭的神经外科手术室，外人根本无从知晓其中的秘密，就是共事多年的同事、助手、手术室护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也只能见到他暴露在公众面前的一面。或是在手术台上卓尔不群；或是为减轻病人痛苦舍生忘死；或是在金钱面前安贫乐道；或是面对临床弄虚作假切齿痛恨；或是陷入牛蹄之涔志向不改；或是在攻克手术禁区中孤独寂寞；或是受到诬陷迫害仍坚持为病人做手术；或是在非常时期采用非常手段照料掌上明珠；或是给老伴做一名工程院院士级别的仆人；或是对通过政治途径谋取学术上的名誉不齿。而对于一位以人脑为研究对象并拥有丰富人生阅历的医学巨匠，但见其一侧影，无异于只看到一鳞半爪，是很难说了解他的。

王忠诚的个人历史与中国神经外科发展史，如同经纬交织在一起。在长达六十年的医学实践中，他始终站在全局的高度及时采取可行的方案，加强中国神经外科学学科建设；从哲学的高度探讨神经外科的一般规律和范畴，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不断就临床实践中发现的新问题进行研究，并形成成果重返临床应用，开创神经外科新领域；以对热点问题深刻的洞察力，在多个重大学术问题上，引领学科沿着正确轨道发展，并占领学术制高点。

每一个学术思想，从萌生到成熟，虽要经历数年甚至数十年，但最后的临床结果与王忠诚最初的猜想，却少有不吻合不一致的。因此就说他有神灵相助，当然有悖于科学。但对主宰呼吸、心跳、循环、消化、意识等一系

列维持生命的脑干——世界各国神经外科医生谁都不敢触碰的人体器官，用手术刀打破禁区对其传统定性做出颠覆性的改写，给全世界脑干肿瘤患者带来生的希望，不用天使降临人间表述，真难以准确地解释这一旷世之举；而《神经外科手术图谱》《显微神经外科》《脑干肿物及其治疗》和《神经外科学》等一系列皇皇巨著，则为他奠定了常人难以超越的学术地位。但是，神经外科病人及家属，对于这类学术味道很浓的说法普遍不感兴趣，他们更倾向于用民间通俗的语言，比如“活菩萨”，表达对王忠诚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

王忠诚领导下的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是仅次于美国凤凰城神经外科研究所、中国国内手术量最大的神经外科临床医疗机构。还是在一名普通住院医时，他就自觉地将减轻患者痛苦，定为人生的奋斗目标。正因为是自觉的，而不是被要求的，于是在他的行为中便出现一系列特殊现象：经历过挨饿、受冻、辍学、代课、送煤球、当家教、被诬陷、受迫害等人间种种磨难；抵制过急功近利、弄虚作假、临床腐败、草菅人命等世间种种荒唐；不惜以付出个人白细胞为代价，创造临床检测新方法；在手术台上，长期保持难以逾越的高治愈率和低死亡率；在门诊和住院病房，挥洒自如地将语言描述变成患者功能恢复到正常人状态。

王忠诚具有为高层政要开展临床服务的特殊身份，能受国家重托，前往阿尔及尔，为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治病，能作为保健大夫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能当面接受挽救著名女外交家龚澎生命的总理托付，却从不因此就以居高临下的眼光，俯视天下苍生，把为人民服务视为向人民施舍，而是始终将“如何更好地为劳苦大众修复身体健康放在心上”。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并年届古稀的王忠诚，仍前往中国西部地区，为农村重症患者免费做手术。

这来自于他的一种独到的见解：“病人是医生的老师，医生没有任何理由不尊重老师并爱护老师；是病人用自己的痛苦甚至生命，在向医生传授医学知识；医生个人的名誉永远没有抢救病人的生命重要。”认识与众不同，与患者间的关系也就同样独特：无论病人及家属心情多么焦急、性情多么乖张、脾气多么暴躁，一到他面前就会变得安静温顺配合。他所在的门诊室、急诊室、手术室和病房，与华佗、张仲景的一样，既不需要媒体为之主持正义，也不需要警察帮助维持现场秩序，更不需要为维护这片净地专门立法。

中国神经外科病种之多当属世界之最。这一国际公认的难题需要一流的

医疗服务才能解开，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十年，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广大农村地区，却普遍缺乏必备的医疗设施和能治大病的医生。王忠诚对于国家的价值恰恰就在这里，他是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医生，却把普天之下的病人放在心上。心忧天下推动他追求永无止境，在中国神经外科历史长卷上，用娴熟的手术刀绘制出超国际一流的治病救人效果图，带领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小团队并引领中国神经外科大团队，成功地掌控神经外科国际话语权。

1996年11月6日上午，在悉尼召开的第八届神经外科国际会议上，王忠诚刚做完学术报告，澳大利亚神经外科学会秘书长 Leigh Atkinson 教授就匆匆来到他的面前，用朋友之间才会使用的亲切用语，赞美他临床手术的不同凡响：“王院士，您在脑干肿瘤手术治疗上所作的成绩令人敬佩，你的报告题目应该改为 The art of neurosurgery（神经外科艺术）。”这绝不是偶然的。

顺着 The art of neurosurgery 这个新名词提示的方向看这部传记，或许可以认为这是一部反映一名中国神经外科医生如何运用灵巧的柳叶刀、完成传世佳作的纪录片；一个由仁者与患者；光明与阴暗；临床治疗与医学哲学；沉渣泛起与政治清明；殚精竭虑与无可奈何；坚持人道与背离人道；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医生荣誉上的体现与手术刀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坚持等诸多元素构成的离奇故事。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掌控国际话语权 / 7

第二章 高中跨省市择校 / 31

第三章 千遍万遍自责 / 55

第四章 突破手术禁区 / 69

第五章 病人是医生的老师 / 91

第六章 十年一个梯队 / 113

第七章 陈云出面说话 / 139

第八章 划时代的标志 / 157

第九章 戳穿新疗法假象 / 179

第十章 告别政策“一边倒” / 195

第十一章 影响后世三代人 / 209

第十二章 一声叹息 / 231

王忠诚大事年表 / 249

后 记 / 253

第一章

掌控国际话语权



1984年4月28日，应中国政府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乘坐空军一号飞抵中国北京首都机场，偕夫人走下机舱外客梯时，在机场欢迎的人群无人想象得到，对电影艺术十分在行的这位美国总统，将要利用这次访华的机会，就医学领域中年轻而又神秘的神经外科，代表美国这个称雄国际的神经外科强国，发表一番出人意料的评论。

一个人同一个国家一样，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设若可以，那么这位美国第40任总统在中国境内发表演讲时，现场有没有王忠诚，效果将大不一样。依据来自于一位权威人士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现在能拿得出去的，是神经外科。”而中国神经外科在当下的领军人物，正是王忠诚。

带着浓重江浙口音讲这番话的吴阶平，是中国泌尿外科泰斗。跳出个人十分钟爱并为之奋斗一生的专业，公开推崇并不属于自己的另一个专业，在自然科学领域，是极为罕见的一种现象。更为难得的是，在吴阶平公开发表评论后，整个医学界并没有出现不同的声音。

里根抵京当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在要闻版显著位置，专门辟出一角刊登《人民日报》社论“热烈欢迎里根总统访华”。并在社论的上方配发新华社发出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照片和有关里根个人经历的“人物介绍”。

里根总统是第一次访华。他对中国的这次访问，是对中国国务院总理在数月前访问美国的一次回访。

1984年1月7日至1月16日，中国国务院总理访美期间，受到美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人民日报》在4月26日发表的社论中，为此特别做出回应，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里根总统和夫人的来访，表示热烈的欢迎。”但在中国民间，对于这位美国总统的热情程度，似乎没有对于在中美两国关系上实现破冰之旅的理查德·尼克松总统那么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二十三年间，中、美两国分别置身于完全敌对的两大阵营。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第一大国，堕落为对外侵略扩张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而敌对阵营中的美国，却频频向中国示好。最善于从战略上牵制敌人的毛泽东，顺应时代发展变化，及时调整中国的国际战略部署，向过去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的国家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发出访华邀请。

这是新中国外交的大手笔。从中、美两国秘密磋商开始，就把世界各国蒙在鼓里。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走出美国空军一号机舱、在中国

北京首都机场突然亮相的刹那，让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中、美两国人民无一没有“世界变了样”的感觉。

1972年，中国已经在北京建立起全国第一家电视台，但普通老百姓和这家以“北京”命名的电视台，却遥不可及。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现场画面，普通老百姓是从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专题纪录片看到的。

美国总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缓步进入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面带微笑，上身前倾，谦恭地伸出右手，耐心地恭候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的接见。这个历史性的画面，正对中国人阅读国际政治的胃口。毛泽东伟岸的身材，幽默的谈吐，对国际社会的充分了解，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分析，对会见过程的全面掌控，让永远忘记不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中国人，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扬眉吐气。

三十三年后，中国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实施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仍不忘将中、美两国领导人的这次历史性会面，列为重大选题，创作大幅油画《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向建国六十周年大庆献礼。

看人习惯于首先看出身和背景的中国人，在私下嘀咕，“这个从好莱坞出来的美国总统，恐怕不大可能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东西”。

红旗牌轿车的车头两边，分别插着中、美两国国旗。国宾车队载着里根夫妇及其随行人员，离开北京首都机场，途经中国的政治标志天安门广场、进入西长安街的途中，国宾透过车窗，可以清楚地看到，街道两旁手持鲜花的欢迎人群；而对人群中的嘀嘀咕咕，直到下榻钓鱼台国宾馆也不曾听见。

里根的随行人员，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其中最神秘的人物，是总统的保健医生鲁奇。胖乎乎的鲁奇进入钓鱼台国宾馆客房，就随手紧闭房门。他打开旅行箱，从中取出一套笔挺的咖啡色西装换上，接着系上一条黄色领带。然后就站在穿衣镜前，上下前后仔细地端详。直到脸上露出不错二字，方才离开客房，下楼钻进一辆黑色的红旗牌轿车。再次现身的时候，他已安稳地坐在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贵宾接待室的一张沙发上，品尝一杯刚沏的西湖龙井。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和北京天坛医院，设在同一个院内，与中国名胜景区天坛公园隔墙相望。两个机构隶属于同一个党委领导，医院院长和研究所所长实行一肩双挑制。承担双肩挑这副重担的，正是王忠诚。鲁奇来访这天前后，他正率中国神经外科代表团访问美国和加拿大，与这两个神经外科

强国进行学术交流。当日出面接待鲁奇的，是王忠诚的助手、研究所副所长赵雅度。

“我非常希望知道，中国神经外科的历史和现状；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能治哪些疾病，以及临床疗效。”鲁奇一口气提出他所希望知道的全部问题，赵雅度顿时感到轻松了许多。他对这些问题早已烂熟于胸，用不着准备就可以回答。

“您的介绍令人非常满意。”鲁奇彬彬有礼地向东道主表示感谢。赵雅度微笑着等待贵宾进一步提出要求，包括到住院病房和手术室参观，他都可以满足，但却没有下文。鲁奇听完介绍，就起身告辞。他钻进轿车，就绝尘而去。

王忠诚回京后，听完对这件事的介绍，并没有进一步询问有关情况。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而在美国代表团那边，鲁奇的这次访问，却如剧作家在创作前，深入生活寻找依据。

鲁奇为完成总统交给的一项任务，在随同总统出访中国前数月，就已经开始做准备工作。甚至将两个正在访美的中国人，请进白宫面对面咨询有关情况。

这两个中国人都是王忠诚的学生，一个名叫李世绰，另一个名叫黄山。李世绰是国家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后，王忠诚招收的第一名硕士研究生。鲁奇与他在白宫会面时，他正以中国卫生部国际合作司司长身份，在美国卫生部进行访问。黄山原是中国空军总医院的一名临床医生，1979年考上王忠诚的研究生。他拿到博士学位后，即前往美国发展。鲁奇见到他时，他是美国一家医院的临床医生。

鲁奇是以美国神经外科专家和美国总统保健医生的双重身份，在美国白宫会客室，与王忠诚的两个学生见面的。在这次会面中，宾主之间的谈话十分融洽，但内心的想法却相去甚远。中方二人系同门师兄弟，来白宫是为了参观白宫；鲁奇乐意接待他二人，是为了向他二人了解中国神经外科的现状。也就是在这次会面时，鲁奇向他二人透露：他将随同里根总统访华。但没有透露访华的具体时间和其他任何细节。

李世绰与黄山，以及后来的赵雅度，他们三人谁都没有想到，鲁奇在华盛顿和北京两地，分别与他们三人的交谈，是在为里根访华做准备。

4月30日，结束在中国首都的访问，里根一行飞抵《上海公报》诞生

地。当日下午3点15分，身着深褐色西装的里根总统，由上海市市长汪道涵、文化部部长朱穆之二人陪同，来到国际知名学府上海复旦大学参观访问，受到复旦校长、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复旦名誉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以及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谢希德教授在四十年前，曾就读于美国史密斯学院。而这所学院恰好是里根夫人南希的母校。从旁得知这层关系后，里根立即兴奋不已，面对围在身边的复旦学子，用幽默的语言说：“看来我同复旦大学间存在着某种‘家庭联系’。”配以极具感染力的面部表情，里根像是在向久别重逢的朋友，倾诉内心的思恋之情。复旦学子的掌声和笑声，顿时响彻屋宇。随后学子们便开始无拘无束地用英语向里根提问。

“总统先生，请问此次访华，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印象最深”翻译成中文很有可能会译成“印象最好”，并出现在第二天的中美两国报纸上。里根显然不愿意看见这样的结果，就再次借用电影表演手法，用诙谐的语言，说出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呢。”

一刻钟的交流结束。里根在汪道涵、朱穆之、谢希德、苏步青的陪同下，步入复旦大学“相怀堂”，开始发表演讲。

在国与国的交往中，这类演讲照例都是官样文章，开场白不外乎是大讲对方爱听的好话。

“从太空都能看到巍峨壮观的万里长城，还有古城西安、秦始皇陵和出土的兵马俑大军。”短短三言两语，里根就把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在历史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做出了一个简要的概括。不过，中国历史上取得的这些成就，早已为世人熟悉，不能算作新闻。

接下来里根用不小的篇幅，回顾中美双方尤其是在教育方面的友好交往。并在转换到这个话题前，使用了一个关键词“谈谈未来”。他说：“我今天想和你们这所著名学府的年轻人谈谈未来，谈谈我们共同的未来，谈谈我们怎样才能发挥治学的才智和探索精神来了解彼此的情况，改变人类的生活。”

这是中美双方共同关注的课题。不过，复旦师生注意到，里根在回顾中美两国的交往中，特别突出美国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他说：“现在，中国在全世界的学者和学生已达两万多名，其中一半以上到了美国学习。”并着重强调“美国的‘富布赖特奖学金计划’拨给中国的奖学金，比拨给任何其他国家的都多”。

这段话的潜台词是，美国待中国不薄。用意非常明显，却是中美双方友好交往的事实，不会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心。复旦师生并不感觉刺耳。

接下来的演讲内容，突然转入一个崭新的方向。不是炫耀美国经济多么繁荣，不是炫耀美国军事实力多么强大，不是炫耀美国现代科技多么发达，不是炫耀美国现代医学多么先进，而是用铿锵有力的语调，高度赞扬“中国在神经外科、用草药治病等方面，有许多东西可供我们学习”。

“我们”二字有着十分明确的指代。这句话完全可以理解为，中国在神经外科、用草药治病等方面，有许多东西可供“美国学习”。其中，“中国神经外科”对应整个美国的神经外科领域；“用草药治病”对应整个美国的临床医学领域。

一向在意外国如何评价中国的中国官方及媒体，这一次却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在意。里根选择在最贴近国际前沿的中国城市，面对思想十分敏锐的中国知识分子，高度赞扬中国取得的成就，中国媒体居然没有借题发表一篇评论文章；中国官方居然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甚至个别高级官员“不相信里根说过这样的话”。

在中国国家机关，第一个掂量出里根讲话分量的，是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他从5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看到里根的讲话，就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北京天坛医院党委书记石金祥，说：“老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忠诚给咱们国家争得了荣誉。”声音充满了喜悦和自豪。

石金祥放下电话就驱车前往北京市委，向主管意识形态和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干部报告这个好消息。不料竟碰了一鼻子灰。“我天天看报，从一版看到八版，从不漏过任何一条重要消息，从未见到里根讲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要没有根据地凭空乱讲嘛”。

石金祥未做任何申辩。他伸手将领导干部办公桌上的一堆报纸，拿到面前一张张查找。找出5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翻开其中的第三版，从办公桌上拿起一支红铅笔，在“中国在神经外科、用草药治病等方面，有许多东西可供我们学习”这行字下面，重重地画上一道很粗的红线。“你看，这是什么?!”

美国总统说中草药可供美国“学习”，并不是一句客套话，或是一般意义上的外交辞令。里根总统的讲话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新大陆尚处于蛮荒时代，中国就已经开始用中医、中药预防治疗疾病。数千万人历经两千

多年临床验证表明，西医、西药治不好的病，中医、中药未必同样治不好。临床医学没有国界之分。中医、中药的存在，不单是中国人之幸，更是全人类之福。对于里根总统提出的向中国“学习”，中国中医药界没有必要过分谦让。

神经外科同样如此。它属于现代医学。在中国国内，整个现代医学都是从西方国家照搬过来的，因此民间又把它称之为西医药学。其中，神经外科进入中国时间最晚，资历也就最浅。

美国已创造发明出“脑室空气造影”，并撰写出《脊髓外科》《胶质瘤分类法》《颅内肿瘤》等一系列神经外科专著，中国西医学界在临床上，这时还没有接触神经外科；美国已经进入神经外科高级阶段，B超、CT、MRI这些现代临床检测手段已普遍得以应用，中国神经外科还停留在初级阶段，用风险极大的“脑室空气造影”为病人检查病变。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神经外科迅速发展，其中，成就最显著的是王忠诚领导的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就这一个团队的手术量，即占了中国半壁江山，排名全国第一。但与美国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美国凤凰城神经外科研究所，同样是一个临床医疗团队，手术量比中国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团队，年均高出1000台。

在里根访华前十年，美国的神经外科权威Bailey P，就已被国际公认为现代神经外科的奠基人之一。国际神经外科专业通用的命名，诸如星形细胞瘤、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髓母细胞瘤、室管膜瘤等，几乎全部来自Bailey P这个权威提出的《分类法》。就连Bailey P培养的学生，比如Bucy、Sweet等都是国际著名的神经外科学专家。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大约在里根访华前十二年，美国另一个神经外科权威Bucy PC，就已经开始担任国际神经外科协会主席这个重要的学术职务。并创办国际神经外科学界最重要的学术刊物*Surgical Neurology*杂志。

知道了这段历史，就知道了里根讲话的意义何在，同时，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自然科学包罗万象，医学仅是其中的一个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神经外科仅是大外科中的一个亚科，且在其亚科之中，位置并不靠前。美国总统为什么要把排名靠后的亚科，从中拎出并提升到“可供我们学习”的高度，给予充分肯定；而没有选择普通外科、胸部外科、腹部外科、肝胆外科、泌尿外科、骨伤科等其他亚科，给予高度评价。

美国总统为什么要把中国神经外科捧上天？如果是出于某种政治需要，

那么尽可以拿东道主引以自豪的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做文章。美方只要提出需求，东道主必定乐意配合，而且会把“两弹一星”放在最显眼位置，提供给对方。

对于国家元首站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讲坛上，高度赞扬这个国家的神经外科，带有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之嫌，美国神经外科学界却未就此向总统先生提出抗议。这与几件事交织在一起，并不断发酵升温直接相关。几件事都围绕着一个中心人物展开，这个人还是王忠诚。

发生在美国本土的一件事，涉及在旧金山谋生的一个华商。他姓张刚四十出头，事业正往上走，却被查出患有脑膜瘤。美国未能治好他的病，他便掉头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王忠诚没有让这个海外游子失望，不仅成功地为他切除脑膜瘤，而且让他术后功能完全恢复。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人，不像此岸的中国人，将脸面当回事，否则将会感到无地自容。

发生在汉阳的一件事，同样涉及中美双方。汉阳一家医院的一个中年护士，视力在一个月内急剧下降到接近零。到本院眼科检查，医生说病根在她颅内。转到神经外科检查，发现她颅内长有一个巨型鞍结节脑膜瘤。它压迫视神经，导致视力急剧下降。但是，走遍武汉三镇，没有一家医院不说“手术非常危险，已没有办法恢复视力”。

她被迫打电话到美国，向兄长求助。兄长放下电话，就在全美范围寻找最好的医生。而就在她即将启程的前一天，兄长却又改变了主意，“美国神经外科专家告诉我，你应该就近到北京天坛医院找王忠诚教授，没有必要舍近求远来美国治疗。美国专家还说只要找到王教授，你的病就有治愈的希望”。

遵照兄长的电示，护士第二天就从武汉飞到北京。结果正如美国神经外科专家所言，王忠诚手到病除，她的视力得到恢复。消息传到兄长所在的国家那边，引起的反响并不弱于中国这边。

然而，在国际上，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像美国那样，敢于公开承认中国神经外科取得的成就。1980年在瑞士首都日内瓦召开的世界神经外科学会期间，王忠诚在会上做学术报告，刚刚说到“我们已经完成了脑肿瘤手术3000例”，后面还有更精彩的内容尚未来得及介绍，发言就被一个欧洲国家的代表粗暴地打断。

“等等，你的数字有误，后面多了一个零”。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与会者目光齐刷刷转向王忠诚。如果脑肿瘤手术统